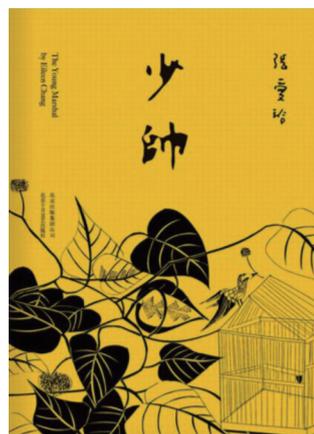


删人快语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张爱玲
《少帅》

止步未完成

□ 蒯乐昊

张爱玲的《少帅》没有写完,英文原稿81页,翻译成中文也就3万来字,作为一本书,它有些过于薄了。

张爱玲的研究者们更多地发力在她的早年著作上,那些被她留在身后的少作,知名度更大,也拥有更多的粉丝,而她在去美国后的创作,相比之下显得研究不足。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张爱玲在离开母语环境后,由于种种掣肘,在创作上元气衰弱,不复当年才情。但以张的勤奋和抱负,她其实一直没有停下对小说的探索。

用英文写作让张爱玲水土不服。她最后的20年一直在打磨《海上花列传》的英文翻译,这个书名,最直接的译法就是The Flowers of Shanghai,既明白晓畅,也语带双关。但是张爱玲一定要把它翻译成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上海歌女,亦所谓“先生姑娘”。因为当年上海长三堂子里的高级妓女,是被称为“先生”的,这也是这群女人身份独特性的一个象征,她们虽是烟花女子,但自幼受到严格琴棋书画训练,在文化阶层上显得优越娴雅。跟当时普通良家女子包办婚姻不同,青楼里这群被称为“先生”的高级交际花享有自由恋爱的特权,甚至可以自主选择心仪的恩客。而“Sing-song(唱歌)”一词的发音,就酷肖上海方言里的“先生”。不得不承认,这种翻译,苦心孤诣,妙趣横生,老外读者却未必能摸不着头脑。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美国编辑就说,“It's very good, but People don't talk like this.”——(她英文)是很好,但人们一般不这么说话。

张爱玲在美国的英文创作生涯,可以说处处碰壁,最初六年,她所有的创作竟无一出版。当她的《粉泪》被出版商拒绝之后,她沮丧到病倒,卧床数日,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恢复过来。两年后《北地胭脂》又被拒,张潸然泪下,情绪低落至极点。一日她梦见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作家取得了极大成就,相形之下她觉得自己很丢人,第二天,她泪流满面地向丈夫赖雅复述了这个梦境。连赖雅都不免疑心,这次退稿,她怕是要被美国文坛彻底抛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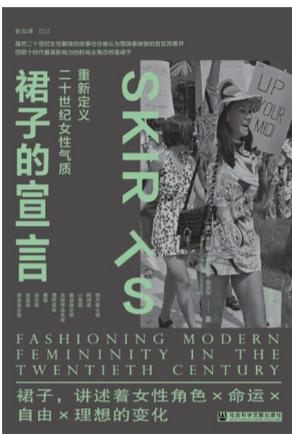
《少帅》也是一样,这部手稿写于1963年,当时张爱玲住在旧金山,准备用这本书打开美国市场。从题材来看,这个以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为原型的故事显然具备引爆市场的要素:宏大时代背景、政治秘辛与爱情。张爱玲向来重视历史细节,1961年,她远赴台湾,搜集写作材料,甚至希望能够采访张学良,但张还在被国民党软禁中,这一采访要求没有被允许。

回到美国后,张爱玲又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大量参考资料,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三年来,我的一切行动,都以这小说为中心”。政治并非她的强项,她试图找到一种切入方式去还原复杂的时局,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爱情模式是她所熟悉的,已有婚姻、野心勃勃又富少年气的自己,稚嫩而被动的少女,因为一场懵懂的爱情,便把自己抛入时代漩涡,她很容易就把她与胡兰成的情缘代入其中。

小说一共写了七章,军阀混战之下动荡的中国,历史背景和人物都相当庞杂,张爱玲动用了她从《孽海花》里学来的本事,用宴席上人们的谈论,来虚写时代大背景。“吴蟠湖、冯以祥、段庆莱……”这些发音相似的名字,中国人很容易明白她写的其实是吴佩孚、冯玉祥、段祺瑞。政治斗争风云变幻,化成吃瓜群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张学良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名字,只以“少帅”相称,蒋介石则是“那个刚刚跟孙博士成为连襟的继位人”,这种笔法,令老外读者一头雾水。在已经完成的七章里面,能明显感受到,一旦写到爱情,她便驾轻就熟,有大量的细节、心理,曲折幽微。一旦写到政治,虽然都有真实依据可考,依然显得虚渺。她在美国的文学经纪人对初始几章评价不高,这使张爱玲的写作信心大受打击,她意识到,自己是在一块并不熟悉的盐碱地上耕作。

张爱玲本来计划,从张学良和赵四的相识写起,一直写到西安事变,主线仍是爱情。这种故事结构,其实是另一种《倾城之恋》。但她败下阵来,只写到张学良到南京出席国民会议便即搁笔。她写道:“他已经结束了军阀时代……终于是在二十世纪了,迟三十年,而他还带着两个太太,但是他进来了。”

故事戛然而止,留下了永远的未完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金伯利·坎贝尔著 李景艳译
重新定义二十世纪女性气质
《裙子的宣言》

我的身体谁做主

□ 陆远

法国大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曾这样说:“如果我可以从死后一百年出版的书籍中选择一本,你知道我会选择什么吗?我绝不会从那个未来图书馆里选一本小说,而只会拿一本时尚杂志,这样就可以看到我离开一个世纪后女性的着装。”在法朗士看来,“这些衣衫比所有的哲学家、小说家、先知和学者更能让我了解未来的人性。”法朗士是1924年去世的,如果他泉下有知,在去世整整100年后的今天,不知道会不会选择我手上的这本《裙子的宣言》——尽管不是一本“时尚杂志”,却也比任何一本杂志都能更全面地展示20世纪西方女性裙装的变迁。

话说回来,像法朗士这样的19世纪老派绅士如果真正穿越到21世纪,面对当时时髦女郎们的装扮恐怕会大跌眼镜。毕竟,在他生活的年代,女性连穿裤子都是不被允许的,那些敢于标新立异的先驱人物,甚至会面临牢狱之灾——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无论西欧还是北美,因为在公开场合穿着裤装而被捕的女性都不在少数,罪名大多是“有伤风化”。在法朗士的祖国,据说有一项于1800年颁布的禁止女性穿裤子的法令,直到2013年才被正式废除。

在过去的几个多世纪里,女性为争取穿裤子的权利进行了长期的努力,每个时代引领风潮的名单都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其中不乏许多为全世界所熟悉的名字:可可·香奈儿、玛琳·黛德丽、凯瑟琳·赫本、小野洋子等等。更不用说那些激烈的女性主义者喊出的口号:“热爱你的裤子吧,它是武器”。人们对女性穿着裤子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这往往被视作女性解放的外在标志。不过《裙子的宣言》的作者、20世纪时尚史的资深研究者金伯利·坎贝尔似乎故意反其道行之,尽管她强调本书绝非一部“反裤装宣言”,但同时她坚持认为,“就舒适度、新颖性、实用性、现代性或进步性而言,裙子并不一定与裤子对立或者不如裤子”。事实上,女性长期以来一直穿着裙子登山、探险、骑马、骑车、干体力活儿,甚至从事体操、击剑、滑雪甚至拳击的运动;居里夫人两次穿着裙子领取诺贝尔奖;数学家凯瑟琳·约翰逊穿着裙子操作计算机将人类送上月球,民权运动英雄罗莎·帕克斯穿着裙子与白人抗争……坎贝尔说,20世纪的女性并不需要刻意地通过“穿上裤子”来展示她们在身体和社会自由方面获得的进步,那种单纯以外在着装判断女性权利的观念,何尝不是另一种刻板印象和惰性思维?既然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最重要的女性服装还是裙子,那么对20世纪女性裙装史的梳理,就是一种具有学术价值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女性气质(以及男性气质)在定义和表达方面的变迁,或者用法朗士的话说,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性”。

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坎贝尔对20世纪新出现的10种女裙款式进行了图文并茂的知识考古。爱美的女士们或许会把这本图文并茂的小书当作赏心悦目的裙装指南,一册在手,美丽我有。我更感兴趣的倒是那些由裙子勾连起的重要历史时刻。比如,作为一种裙装样式的“裸裙”首秀,是在1962年5月19日。那一天,36岁的玛丽莲·梦露在曼哈顿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的美国民主党筹款活动上为即将年满45岁的肯尼迪总统献唱《生日快乐》。当她脱下皮草披肩,露出一件镶有2500颗水钻的透明肉色薄纱罗拖地长裙时,全场观众都惊呆了,因为从他们的角度看过去,梦露好像什么也没穿,只镶着2000多颗水钻。这件长裙代表着梦露一生最后的高光时刻,也是20世纪美国政坛最引人注目却又最扑朔迷离的桃色事件的象征——晚会结束后不久,白宫的机要人员就得到密令,要求销毁当晚所有与梦露相关的照片,而仅仅78天以后,一代佳人就被私人医生发现暴卒于卧室。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当选总统,也是战后美国国家形象历史叙事的重要元素,他与梦露的关系,无疑给这种集体记忆增加了一抹暧昧而神秘的色彩。

一本令人轻松愉快的大众读物,如果在一饱眼福之余能够激发读者更具反身性的思考——比如,究竟什么叫“穿衣自由”?或者,如何通过重塑服装美学建立更和谐的性别关系?——就更为可谓善莫大焉了。这一点,《裙子的宣言》做到了。

远见近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乌克兰]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大师和玛格丽特》



奔逸与狂欢

□ 张怡微

舞台剧《大师和玛格丽特》再次到上海巡演,我和李建军导演在复旦相辉堂做了个分享活动,借此机会重读了这部著名小说。在去年的专栏里,我们曾提到在疫情时,全球的读书爱好者聚集在互联网上,开了很多经典重读的小社群,大家在一起重读托尔斯泰等巨匠名著,李翊云的《战争与和平》读书会,后来还做了书。在这些文学爱好者看来,如果在那样的时候还不翻开这些“大部头”的话,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在这些纷繁的读书会活动中,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也是一部热门重读文本,以至于同名舞台剧在戏剧节上演时,引发了小小的轰动。

布尔加科夫的全名是米哈伊尔·阿纳法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年出生于基辅,直到现在也是媒体中可见的是非之地、创伤之地。布尔加科夫的家族是一个神学教授家庭,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东正教教士,父亲是一位东正教学者,母亲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经是一名教师。他青年时曾经学过医科,后成为乌克兰人民军的军医,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得过伤寒,差点死去,也因此无法去欧洲继续求学。安顿在莫斯科之后,布尔加科夫弃医从文。“果麦”版本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收录了著名作家余华的序言,余华很喜欢布尔加科夫,他们有着相似的医学从业经历和生涯选择。1923年起,布尔加科夫创作了中篇小说《狗心》《不祥的蛋》,整个20年代下半期,他创作成果多产、创作力旺盛。1928年底,布尔加科夫开始构思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却不想1929年后,厄运开始眷顾他。由于剧作被打上了“美化移民和白军形象”的标签,布尔加科夫的话剧作品连同作家本人沦为批判嘲讽的对象,被莫斯科主流戏剧界乃至文艺界排斥。1930年,穷困的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求助信,希望能谋得莫斯科艺术剧院助理导演的职务。羞辱并未完全停止,作品出版无望,这样的处境一直伴随着布尔加科夫,直到他1940年逝世。布尔加科夫最著名的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直到1966年才由一家莫斯科的杂志社删改后刊登。好在这部写给未来的“抽屉文学”,最终收获了很好的声誉,直到如今,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它。

对文学爱好者来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小说结构十分迷人。原著分成两大部分,每个部分草蛇灰线,以奇特和荒诞的逻辑编织魔幻与现实交融的可能性。第一部分有两条故事线索,一条是撒旦以“外国人沃兰德”的面貌降临莫斯科,另一条则发生于2000年前耶稣被审判的耶路撒冷,故事详尽描写了罗马帝国的犹太总督彼拉多审判并处死约书亚(善的意志的代表)的故事。彼拉多形象具有双重性。作为耶路撒冷的统治者,他残酷暴戾;作为人性未泯的地方官员,他矛盾胆怯。政治上的高压,使他最终还是很不情愿地死死了约书亚。他试图赎罪,试图为自己洗刷罪行,但是他仍未逃脱长达1900年的良心的折磨。这两条故事线像音乐声部一样交织在一起,映射着追索“良知”的主题。

在现实主义的故事层面,撒旦先在牧首湖畔公园里现身,见到了一名莫文联主席,和一名年轻诗人。撒旦与他们友好交谈和辩论,并提前预告了文联主席马上会死。青年诗人在目睹了一切如撒旦预言所发生之后,被送去了精神病院。文联主席死亡之后,他原本要赶去主持会议上爆发了一场狂欢。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青年诗人后来在精神病院遇到了“大师”,此时小说已经叙述了150页,“大师”姗姗来迟,玛格丽特则要再晚一些才会现身。小说第二章就详述的耶稣被审判的故事,正是“大师”想要烧掉的小说手稿。《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下半部,则从大师的情人玛格丽特写起。她与撒旦做了交易,涂上了魔药之后变成了可以飞翔的圣女,这一章节写得无比诗意,玛格丽特以爱情为名营救精神病院里的大师以及他的作品,最终得以逃离这个灰暗的世界。故事看似荒诞离奇,小说的内部布置却存在着一系列的对应关系。不同层面的故事在亦真亦幻的叙述中合为一体。可惜的是,舞台剧中删除了彼拉多线,更具体和直观地放大了小说中“狂欢”和“奔逸”的情节。重读时,我更关注的一条隐线,其实是青年诗人的精神成长。直到他进入精神病院之后,他对神、文学和现实世界的理解才有了丰富的生发土壤。他是被这场狂欢遗落的人,却也再无法回到牧首湖畔的天真,他成为了一名学者,经历了难以言喻的精神历险,穿越了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任何进步的两千年。